

 宁夏诗歌学会丛书

宁夏诗歌选

杨梓 主编

上册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四百多位从唐代到现代的诗人首次聚会

权威珍藏了宁夏诗人的集体记忆

一千多首代表性诗作在此荟萃

全面展示了塞上及宁夏诗歌的艺术成就

二万多行诗句排列成千年诗选

整体蕴含了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史料性和

典藏性

十三个世纪宁夏诗歌的发展历程

客观揭示了宁夏诗人的另一个面貌、另一番景象、

另一种风格和另一种意义



宁夏诗歌学会丛书

宁夏诗歌选

杨梓 主编

上册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宁夏诗歌选:全2册 / 杨梓主编. —银川:阳光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525-1649-4

I. ①宁… II. ①杨…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02087号

宁夏诗歌选

杨 梓 主编

责任编辑 赵维娟 谢 瑞

封面设计 黄河梦

责任印制 岳建宁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阳 光 出 版 社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584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7445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54

字数 1000千字

版次 2015年2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25-1649-4/I·486

定价 120.00元(全2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宁夏诗人人格类型摭论

荆 竹

波澜壮阔的社会现实生活是诗歌创作的源泉，这是相当正确的论断。但社会现实生活作为诗歌创作的源泉不会自动流溢出来成为诗歌作品，它必须经过诗人之“开掘”，诗人之“沟渠”，诗人之“拦截”，诗人之“积蓄”，诗人之“翻腾”，诗人之“吸取”，诗人之“过滤”，最后才能成为诗歌作品。在此，诗人作为创作的主体之人格就直接作用于创作过程，从而影响诗歌作品之面貌与品质。同样的社会生活质料，在不同人格的诗人那里，会变幻出主题不同、蕴含不同、格调不同的作品来。我们甚至可以说，有什么样的诗人人格，就会有什么样的诗歌作品。

实际上，一个诗人生活在社会中，总要扮饰一个或多个社会角色，由于每个人所扮饰的社会角色不同，那么他或她就会有自己的特殊之人格，也就必然会以此人格为视点来观察生活，视点不同，观察到的事象也就不同。例如，许多诗人皆面对宁夏这片土地，但在贺兰山、六盘山、黄河两岸等地所观察到的宁夏是截然不同的，甚至以为这是几个不同之省份。从学理上讲，角色之视点与角色之环境构成不同的透视景观。诗人之人格就犹如观察宁夏这片土地时不同之视点，他们对生活之感受与理解皆有自己的“人格视点”。进一步说，解读一个诗人或作品之情形亦复如此。一个诗人的一部作品就是一个地域，这个地域是客观存在，但一个诗人一般只能从一个视点来观察它们，政治的，历史的，社会的，形式的，心理的，皆为不同之视点，皆可以窥视到诗人或作品之一角，却无法把握全部。诗人杨梓编选《宁夏诗歌选》这部书时，选择了“全面”之视点，我所说全面之视点，是说这部书囊括了从晚唐至今的180多位诗人创作的350多首古体诗和20世纪以来出生的250多位宁夏诗人之1000余首作品，这的确是一个“全面”之视点。就阵容而言，已经十分壮观。它必然可以揭示出别的视点无法揭示出的宁夏

诗歌作品与诗人之另一面貌，另一番景象，另一种风格，另一种意义。我以为这部诗选的价值主要就在这里。

一、中国古代文学史是一部诗歌史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宋元以前的文学史，基本上是一部诗歌史。闻一多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中就说：“从西周到宋，我们这大半部文学史，实质上只是一部诗史。但是诗的发展到北宋实际也就完了。”闻一多先生还认为，宋元诸家“都是多余的，重复的，以后的更不必提了。”他还说：“我们只觉得明清两代关于诗的那许多运动和争论，都是无谓的挣扎。每一度挣扎的失败，无非重新证实一遍那挣扎的徒劳无益而已。本来从西周唱到北宋，足足两千年的工夫也够长的了，可能的调子都已唱完了”（《闻一多全集》第10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页）。鲁迅则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2页）。就一部整体中国文学发展史而言，闻一多与鲁迅的这个说法大体不错。但就其具体区域性的文学发展状况而言，可能还略有所不同，比如宁夏的诗歌发展状况就略有微差。从《宁夏诗歌选》一书的古体诗部分来看，基本给予了正面回答。该书所选大都为宋元明清以后诸家诗歌作品。说明宁夏诗歌作品在宋元以后多少“唱出”了一些“新调子”来。诚如时论所公认：“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钱锺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页），宋之与唐，本无可轩轻，实乃艺术趋新规律之合理体现，若合诗境与词境统观，毋宁说是后来居上。宁夏诗歌在先秦两汉至隋唐，基本上是一些士人、将军之类征战或路过此地留下的一些诗歌作品，就本土而言却鲜有诗作流传下来，到了宋元明清以降，才有一些诗歌作品行世。人所共知，作为诗的哲学或哲学的诗，禅宗之引进与诞生，及其向民间尤其向士庶知识分子阶层渗入，使中国传统的心理本体更加深沉了，这就是说，禅使儒、道、屈原之人际——生命——情感更加哲理化了。凡此在唐诗中已有所折射，到宋则反映得益深益显。到宋经由理学之生发，不论表现的若何曲折，在总体上还是可以看到在吸收了庄屈禅之后的儒家哲学与华夏诗歌美学实已达到了最高峰。于是，在这里所追求的，不只是气势磅礴（儒）或逍遥九天（庄）之雄伟人格，也不只是凄楚执着或怨愤呼号之炽热情感（屈），而更是某种精灵透妙之心境意绪，从而境界、韵味，便日益成为两宋及其以后的诗歌作品之重要特色。元明清以后，乃中国古代后期诗歌发展之另一高峰，所有诗歌创作实践，实已总结了唐宋两次诗歌高潮，而又启开了步向封建末世之端倪。事实已经证明了非闻一多先生所言之“多余的，重复的”现象了；再从诗歌艺术之前进运动与基本风貌上看，由宋代季世至清代中叶，逐渐从古典诗歌艺术之目标演化，适应着元明以降商业空前之繁盛，城市消费日渐发达，市民阶层逐步兴起，一种新的社会潮

流在悄然运行，它自然要闪烁折射到诗歌创作领域。在哲学上，从王阳明“致良知”心学之解体过程，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道”之命题；到刘宗周言“道心即人心之本心”，李卓吾之“童心”说，……从明嘉靖到乾隆，诗歌潮流，五花八门，或提倡平易（公安派），或追求艰涩（竟陵派），却共同呈现出对儒家传统诗教之脱离、超出、违反，甚至背弃。自元明以后以城市为中心而形成的古白话，更为诗体之多样化提供了载体，除传统的诗词歌赋以外，更风行诸宫调，散曲、小令、套数、山歌、小调、鼓书、弹词以至杂剧、传奇形形色色之歌诗剧等。总之，如上所述的宋元以后之诗歌创作及哲学基础，形成的创作主张与审美趣味，在中国诗歌流变之长河中形成了又一次高潮，并出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亦即从古典和谐走向近代崇高之开端。而宁夏的古代诗歌创作，大体经历了从无到有至晚唐以后的创作普泛化到精致化之过程；这些，皆已非闻一多先生所言之“无谓的挣扎”和“挣扎的徒劳”了。当然，如果说“挣扎的失败”，则是这个开端终竟成为一朵未能结出硕果之浪花，尽管是巨大之浪花，还是为入主中原之清政府的保守主义文化政策所梗阻，正如元明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为清政府“雄才大略”之铁蹄所践踏一样。中国近代化之历程并未从这里起步，没有能够与西方的“文艺复兴”并驾齐驱，徒令千古扼腕兴叹耳！

至于《宁夏诗歌选》中所收入部分今人所写之“古体诗”，由于当今古体诗词所置身的文学、文化生态语境不同，所创作的古体诗词所反映的思想性、艺术性也就千差万别，这就决定了它们必然会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就像湖中不同之景色，也如同长江、黄河上下游不同之景观。只要我们按照中国古典诗歌艺术创造的审美标准去认真打量，观察其价值立场，并将其纳入整体宁夏诗歌创作之视野，与宁夏整体诗歌创作之文化生态、文学语境结合起来作如是观，其艺术质量与文学地位亦不难估量。首先是一些老作家写的古体诗，其次是一些政界名人与各行各业知识分子所写的古体诗。他们创作古体诗的一些题材选择，往往有感于对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重要事件（节日），或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竣工等，作品均是作者的宏观感受与情感印象，一般不对细腻生活具象作出审美价值判断。从古体诗歌作品所表达的主题与审美感受观之，作者的人格均呈现为一种政治型与人文型相融合的人格特征。此处不赘。那么，究竟如何评价这一部分古体诗词创作，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当然，作为全面展示一个区域性的一部整体文学发展历史面貌的诗歌作品集，今人写的古体诗词理应一并纳入观之，唯此方才符合文学发展之规律与事实真相。下面，我着重就《宁夏诗歌选》的现当代部分，并从诗人人格之角度，谈一点个人的粗浅看法。

二、诗人人格之构成因素

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天翻地覆的世纪。在这个伟大世纪里，中国人民不

不屈不挠，浴血奋战，终于推翻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进程中，面对国际国内纷繁复杂的现实局面，以及极“左”思潮之干扰，中国人民进一步经受了锻炼与考验。在这个大浪淘沙的伟大世纪，一代一代的中国诗人、作家，以及各个不同的个性与人格，在文学舞台上扮饰了不同之角色，宁夏的诗人、作家当然也不例外。他们怀着民族新生与祖国富强之梦，以笔为武器，投身革命大潮，高歌猛进，英勇奋斗。他们悲愤于时代与个人之苦难，抒发不平，长歌当哭；他们或处于守旧心理，为封建传统文化之衰落唏嘘不已；他们或固守心灵之宁静，在爱与美之梦幻中聊以自慰……一部 20 世纪的宁夏诗人人格史，实际上，也是一部现当代宁夏诗人不同类型的形成史、演化史、发展史。其中，既包含着文学艺术自身发展之奥秘，也体现了宁夏诗人在时代发生剧烈变革之岁月里，面对新旧文化、中西文化冲突而艰难选择之过程。作为人类社会之成员，每个人皆离不开特定的生存环境。正是特定的生存环境，直接决定着诗人之人生观和价值观，并进而影响其创作动机、审美理想、艺术追求等人格构成。客观生存环境又可具体分为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与自然环境三个方面。

社会环境无疑是影响诗人人格之第一要素。在 20 世纪的宁夏诗歌史上，我们会看到，将诗歌作为变革现实之工具，一直是许多诗人主导的人格特征，而这正是由这个世纪以来中国的特定社会现实决定的。在举世闻名的“五四”新文化大潮落幕之后，王亚凡、李震杰、朱红兵、罗飞、姚以壮、刘和芳、路展、吴淮生等这样一些历史的风云人物，虽然个人经历不同，气质类型不同，最初的人生理想不同，但却正是由于民族处于危亡的严峻现实，激励着他们不约而同地拿起了文学的武器，为民族之新生呼号呐喊，上下求索。抗战与解放战争先后爆发之后，他们更是感应时代之召唤，走出家庭，走出村寨，到了民族解放战争之前列，在强敌压境之大背景下，以不可遏制的爱国激情，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抗战诗歌浪潮。由于历史进程本身之曲折，使他们的人格也随之起伏变化。“为了陪伴战士的欢笑，/ 为了点缀海岛的风光。/ 战士守护的地方，/ 岛花总在开放”（王亚凡《岛花》）；“屋子里又沉闷又黑暗 / 我站在楼窗前 / 望见自然壮阔的远景 / 就想起从远方寄来的 / 温暖的信息”（李震杰《春天》）。在黑暗、残酷的现实面前，诗人仍然怀有一种对未来美好和希望之期盼。这些诗歌作品，正是诗人人格状态的显现。由此可进一步看出，不论诗歌观念如何革新，社会现实毕竟是决定诗人的人格追求及诗歌去向之关键因素。

20 世纪的宁夏，也是一个文化产生剧烈变革之时代。随着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崩溃，延续了数千年的传统文化走向解体，文化反思遂成时代之热点之一。正是这样的一种文化、语境，同样也在深深地影响着宁夏诗人之人格。许多诗人痛切地感到了自己浸淫其中的封建文化之腐朽，他们将目光投向十月革命之后的苏

联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思潮，希望从中找到民族文化新生之出路。这些诗人，虽然有着反对封建文化，追求民主自由，为民族新生而奋斗之共同志向，但因其接受的文化影响不同，又形成了他们各个不同的文化人格。这些诗人由于较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形成了革命的文艺观。在此后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与中国革命的性质相关，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虽然日渐占据主导地位，但其他一些文化人格，也一直在产生着重要影响，从而构成了 20 世纪宁夏诗歌艺术发展的丰富与驳杂。

影响诗人人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自然环境。在一些个性温和，向往爱与美的诗人中，我们会看到，在他们的心灵深处，常常铭刻着特定的自然环境影响之印记。在年轻时就从上海支边来到宁夏的刘和芳，曾经这样自述过塞上这片热土对其心灵人格的影响：“腾格里是一匹奔腾狂啸的野马 / 沙坡头像魔术师给它戴上了笼头 / 一块小小的翡翠 / 凝聚了人类智慧 / 说梦幻，却是实实在在 / 说真实，但又难以想象 / 不是人间奇迹 / 怎招来无数人为之惊叹”（《沙坡头，腾格里沙漠的绿洲》）；自幼生活在淮河边上的吴淮生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人格状态：“心头的翳云 / 任浪花冲洗 / 我轻轻地把阳光 / 搂进袒露的怀里 / 漂着，不怕随波逐流 / 反正离不开大地 / 漂着，凭它浪打水击 / 我原想拥抱礁石 / 忽然，我竟也化为海水 / 和身边的江洋融合为一 / 大海是我的无限扩充 / 我是大海浓缩的一滴 / 黄昏，我还不想离去 / 仰看睽然而合的天地 / 那天上的第一颗星 / 可是我在海里的影子？”（《海水浴》）显然，刘和芳虽然年幼时也生活在安徽、上海一带，但他感到塞外戈壁热土对他的诗人人格影响是巨大的，“一块小小的翡翠，凝聚了人类智慧”，西北黄土高原之深厚阔达，锻造了诗人坚强的人格心理特征。吴淮生博爱而又旷达圣洁之人格心态，与大海之间有着无法割裂之联系。也正是透过这样一种自然环境对人格之影响，我们或许可以更为全面地理解诗人何以会在不同时代的亢奋激进而终于对自我人格意趣之向往，其中恐怕不仅仅是政治与文化方面的原因。

三、20 世纪宁夏诗人的主导人格类型

20 世纪的宁夏诗人，尽管有着复杂多变的人格，但从主导人格动机与创作活动的外在表现来看，大致可分为从政治动机出发、从文化动机出发以及从超越现实的动机出发这样三种基本类型。

首先，是政治型人格。在波翻浪涌的 20 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实用功利性的政治人格，一直在文坛上占据着主导地位，一直在影响着宁夏诗歌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许多诗人，正是由于更多地受到了社会环境中政治因素之影响，形成了强烈的现实责任感和政治使命感，使他们能够积极投身于社会变革之前沿，成为呼风唤雨之时代弄潮儿。这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出生之诗人更为明显，他

们从改造社会，拯救民族危亡的政治人格出发，以诗歌为武器，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有些诗人，如朱红兵、罗飞、姚以壮、路展、刘和芳、王世兴、高深、张贤亮、丁文等人，则首先是以革命活动分子或共产党员之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在后来漫长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又有许多诗人，从不同的方向，会聚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之中，如杨克兴、高琨、秦中吟、张润、万里鹏、肖川、马乐群、贾长厚、井笑泉、杨少青、刘国尧、蔡锦启、王庆等人；还有从青年时代先后在宁夏工作或军营服役的如雷抒雁、乔良、邓海南、陈幼京、殷实等。这些诗人，有的虽曾有过超越政治的、对纯净的艺术天地或宁静的书斋生活之向往，但新中国成立以后火热的社会现实生活，终于打破了他们平静之心灵，使之放弃了原有的个人梦想，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线，有的来到宁夏之后，终生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理想之激励下，不论是一些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已经成名的老诗人，还是一些刚刚登上文坛之新秀，更是将政治意识置于诗歌创作观念之首位。他们一方面自觉地遵循文艺“为政治服务”之原则，努力为新时代而歌，同时也逐渐为社会生活中某些新的弊端而忧虑，不时产生出以文学干预政治的冲动，从而酿成了一幕一幕的文坛悲剧。新时期以来，文艺观念虽然大为开放，但关心政治，仍是许多宁夏诗人之基本人格特征。诸如参与轰动一时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正是这样一种政治人格特征之显现。

由于人类社会本身之特点，决定了政治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巨大作用，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或民族矛盾尖锐之时代条件下，在历史发生重大转折之关头，政治将构成社会运转之轴心。诗歌之价值，不论怎么说，是不可能完全超越于现实功力价值之外的。因此，从古今中外文学发展史来看，那些真正杰出的文学大师，往往既有着深厚的文化哲学—逻辑素养，同时又有着密切关注现实的政治使命感。宁夏现当代文学史上的朱红兵、姚以壮、李震杰、罗飞、路展、刘和芳、吴淮生、肖川、秦中吟、贾长厚、刘国尧、马乐群、屈文焜等人的诗歌成就，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文学价值与政治价值并重之基础之上的。新时期以来，杨梓、杨森君、梦也、白昌万、马钰、邱新荣、导夫、贾羽、冯雄、单永珍、马占祥、米雍衷、唐晴、虎西山、权锦虎、杨建虎、郭静、阿尔等一大批诗人，也正是以良好的文学素养以及关注现实的政治激情，建立了自己的诗歌业绩。在这些诗人笔下，许多作品，不仅有着较高的文学审美意味，而且富有催人奋发、唤人觉醒之作用。事实证明，一位不关心政治，力图逃避现实的诗人，是难以写出真正为人民大众所喜爱、具有久远的生命活力的作品的。近些年来，宁夏文坛看起来之所以轰轰烈烈，异彩纷呈，但缺乏震撼人心之力作，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在目前我们这个正处于剧烈变革之时代里，许多作家诗人，已经淡漠了应有的思考现

实、关心国家命运、关心民族命运的政治激情。

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一个缺乏深厚文化哲学—逻辑素养的作家诗人，如果只是片面地追求政治效应，同样会影响文学的成就。在20世纪的宁夏文学发展史上，我们看到有个别诗人，正是由于片面追求政治功利，导致了下笔匆忙，来不及精雕细刻，致使其诗歌作品往往政治激情有余而艺术蕴藉不足。尤其在建国以后，由于简单化的“为政治服务”被确定为文学创作的至高无上原则，忽视了文学应有的审美价值，从而成为极“左”政治思潮之牺牲品。故而当我们站在真正的文学艺术的审美维度，回首历史，面对百年来浩若烟海之文学报刊，难以计数的文学书籍的时候，又会深深地感到精品太少之遗憾。

其次，是人文型人格。新时期以来，在从传统社会形态向现代社会形态演进之过程中，造就了一批这样的诗人：他们赶上了一个改革开放的好时代，古今中外经典著作之解禁与大量西方名著之翻译出版，使他们有机会系统阅读经典，触摸大师之灵魂；文化开放又使他们接触了大量引进的西方文化思潮和迥异于“文革”中的封闭式政治教育，这就使他们对“文革”中的封建专制文化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一种更为清醒的批判意识。如此的新型文化涵化，自然也使他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人文型人格，即他们心怀匡时救弊之忧患意识，向往个性解放，在文化艺术创作上反对“文革”遗风，而期望通过“人性”之爱，通过艺术美的感染，来化解人间之纷争与仇恨；通过宣传文化学术开放，来消除社会之不平与社会的某种阴暗面。在宁夏现当代诗歌发展史上，许多诗人正是以此种人格投身于改革开放大潮之中的。从主导倾向来看，表达出来的也主要是这样一种人文型人格。这里，主要以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末出生的一批诗人为主，如高深、张贤亮、万里鹏、丁文、雷抒雁、肖川、井笑泉、王庆等，他们中间有的虽然也曾积极投身于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但与更侧重于政治变革的早期宁夏诗人不同，其出发点是恰遇改革开放大潮带来的文化变革。1983年，大陆人道主义精神之倡导，以及自然人性理念之催生，诗人力图以此为基础建立新的道德伦理，用以反叛逆忤人性、无视自由、压迫与戕害人民群众的封建思想，改良诗歌伦理不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与伦理诉求。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对人的个性自由之肯定，在改革开放初期，众多诗人挺身而出，抨击专制与野蛮，张贤亮干脆抛开当年《大风歌》之经典遗韵，一跃跨入小说创作之殿堂，最终实现了这一梦想。但也有一些诗人意识到文化改造之艰难，终于改换门庭，投身其他行业。当然，还有一些诗人也许由于经历过太多无谓之争斗与陷害，早已产生了对人性沉沦之痛恨，而几乎自发地萌生了对超越政治的人性美之向往。他们经历“文革”以后，重新拿起诗笔，想到的就是用文学“燃烧这个民族被权势萎缩了的情感，和被财富压瘪扭曲了的理性”（沈从文语，见吴立昌著《沈从文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49

页)。在后来的创作道路上，他们也一直力图与政治保持距离，只希望通过富于人性意味的诗歌创作，来恢复民族之生机。在改革开放浪潮中，他们一方面从一个知识分子应具有的现实责任感出发，关注现实变革，同时仍希望诗歌不要成为简单宣传现实的工具，主张诗人应用自己美妙的笔绘制出生命存在中一切美丽的东西。这并不是说，这些诗人不关心现实变革，而是说，诗歌不但要关注现实变革，同时也不能忽略作为诗本身所具有的特殊审美要求。但他们当时为何很少谈诗之文体呢？那“实在是没有这样的实力。或说没有这样的资本”（孙郁语）。后来，这些诗人逐步认识到了孔子“不学诗，无以言”之道理，意思是“不学《诗经》，不会讲话。他懂得文采的重要”。木心说：“我以为，有时候文字语言高于意义”（木心：《文学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8页、775页）。这些认识理念，可以说抓住了文学的“牛鼻子”，是诗的最重要审美价值所在。

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出生的一些诗人中，在关于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的探讨中，在一度兴盛的“寻根文学”中，我们看到的也是宁夏现当代诗人的人文型人格。一些诗人的创作实质，力图从人性回归之文化角度，思考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曲折。这些诗人之人格特征是：他们不再满足于“伤痕文学”那样，着重从政治角度控诉极“左”思潮导致的灾难，而希望通过现实生活的本质，从民族文化心理的历史积淀中，寻找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之契机，厘清与批判其中的消极因素，促进中国当代社会之发展与进步，同时实现宁夏现当代文学发展之深层突破。在杨梓、杨森君、梦也、马钰、单永珍、白昌万、虎西山、马占祥、杨建虎等人的诗歌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种人文型人格。比如杨梓在《西夏史诗》中，力图通过对历史文化的挖掘与唤醒，重振为现代文明压抑而萎缩了的人性；杨森君、梦也、王怀凌、唐晴、米雍衷、单永珍、李壮萍、安奇、郭静等人的诗歌作品，都是通过对边塞、戈壁、大漠、平原普通人的道德伦理抒写，揭示与批判了由于民族保守人格而造成的愚昧、野蛮以及严重后果。这样一种人文型人格，对于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对于丰富宁夏现当代诗歌作品之内涵，刷新文学观念，繁荣整体文学创作，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他们的作品里，具有俯瞰人类生存状况的宏阔视野，具有更高层次的哲学之光的照耀，不但没有受到简单化政治目光的制约，反而使诗歌作品向着纵深方面发展。

三是超然型人格。由于个人经历、气质类型及环境影响之不同，也有许多诗人，不像政治型人格的诗人那样暴风骤雨，风雷激荡；也不像人文型人格的诗人那样有着改造社会的清醒动机，而是避居一隅，力图超然于世事纷争，多专注于诗歌作品之性灵功能、审美功能，以及自我对现实人生之体验，表现出一种平和、安静之境。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出生的新一代年轻诗人，一般都是在90年代后陆续活跃在诗坛上的，他们注重诗歌的性灵、旁观与超脱之表达，对时代政治之表现则相对较为淡漠，显现出来的则主要是一种超然型人格。这一批诗人主

要以杨建虎、郭静、阿尔、刘乐牛、马占祥、泾河、林一木等为代表。他们一般多关注于乡村乡野之人情世故，宗族血脉，乡风土俗，邻里关系，民间之爱，此乃诗人之主要表现题材范围。他们没有经历过“文革”之畸形时代，也缺少前代诗人昂扬激愤之情怀，他们从小受到了静谧恬淡的自然环境之熏陶，紧接着就受到了改革开放后的多元文化精神之影响，骨子里形成的则是一种洒脱自如的气质。故而在诗歌创作中没有政治思想的锋芒，表达出来的则是潇洒、闲适、清淡与超然物外的“审美功能”。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出生的诗人相比，表现出的则是更为异乎寻常的超然人格特征。当然，这些年轻诗人虽然向往恬淡美好的艺术心境，但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仍不乏大爱之情，他们通过乡村乡野人情世故之抒写，相当开阔豁达地表达了20世纪末新型的乡村伦理和宗族伦理之血脉亲情，以及华夏民族文化的精神面貌。仅从“天凉了！深秋的土豆在土里 / 呐喊梦与梦碰撞 / 一道道白光 从返潮的记忆中跃出”（郭静《拾土豆的人》）这样一类作品的诗意语境中，仅从浑然天成、自由随意的诗歌结构中，我们也足以感受到一种飘逸之情怀。

从文学实践来看，超然，当是有利于诗歌创作之人格之一。一位诗人，只有在痛切体验生活之基础上，又跳出生活本身之匡拘，如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指出的需“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才能获得正常之创作人格，才能更好地进入艺术创造之境。正因如此，20世纪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宁夏诗人的作品，虽然在中国诗坛上并不曾引起很大轰动，且作品数量也不算很多，但从艺术角度来看，他们的诗歌创作所达到的高度，却不是许多轰动之作所能比拟的。当然，从历史上看，情况又是复杂的，由于文学创作的价值往往又是与时代要求密切相关，尤其是在民族处于较大政治转折的时候，超然情怀又必然会导致在特定历史语境中之创作缺乏应有的时代感染力，甚至丧失应有的是非标准，从而影响作品的整体价值。因此，像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林语堂、张爱玲等一些作家，尽管依凭超然人格，使某些作品达到了较高的艺术境界，但毕竟缺乏历史的深刻与凝重。至于我们现在有些刚刚步入诗坛的年轻诗人，其创作往往以“小桥流水”“风花雪月”“哼哼唧唧”的一种“超然”人格显现，由于本来就不是以深切的生活体验为基础的，就更谈不上有多少文学价值了。

四、面向未来

从20世纪宁夏诗人的主体人格来看，多方面的缺乏也在制约着诗歌艺术的发展。首先，一流诗歌的创造，需要诗人具备崇高之人格精神，即有着对社会、时代以及整个人类负责的精神。只有如此崇高之人格，才有可能创作出真正崇高的诗作，诚如1800多年前古罗马时代的朗基努斯所言：“崇高是伟大心灵的回声。”相反，如果只是满足于个人自娱或拜金主义的私利动机，是不可能写出真正

成功之作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我们可以看到，有的诗人、作家，虽不无文学才华，但正是因其缺乏高尚之人格追求，而影响了其文学成就。有的甚至丧失了人格，沦为历史的罪人。在近些年来的中国文坛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有的诗人、作家，也因其淡漠了对文学应有的崇高与圣洁之精神追求，公然主张“逃避崇高”“游戏人生”，他们降格以求，粗制滥造，涉笔低俗，而陷入了琐屑与无聊之境。这些缺乏崇高人格之事实，自然影响中国当代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其次，成功的诗歌创作，需要诗人有着建立在广博的知识结构基础上的博大的宇宙胸襟与凌空高蹈之文化眼光。只有如此，才能站在人类历史某种意义的制高点上，以主体理性之光辉，以自由之人格，更为清晰地投射现实人生，从而创作出具有宏阔的审美境界与深远的人生况味之作品。第三，成功的诗歌创作，需要诗人有一种执着于艺术探索的人格精神，即对诗歌本身之钟爱与痴情。只有如此，才能孜孜不倦，潜心以求。而我们的有些诗人，却往往浮躁不安，急功近利，常常以非文学之人格面对文学。尽管有的功利目的是高尚的，但从文学自身之价值规律来审视，如果缺乏对艺术本身之悉心探求，此类功利目的，也许可以化为有着重要意义的宣传读物，却很难成为高质量的文学作品。在我们宁夏的现当代诗歌发展史上，可以看到这样的诗人，他们虽不乏对土地和人民之赤诚，但其作品艺术粗糙不堪，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化之弊端。时过境迁，今天重新审视这些作品，它们更多体现的往往是文学的史料价值，而不是文学自身应有的审美价值。

反观 20 世纪，宁夏诗歌经历了一个变革创新的世纪，兴旺丰收的世纪，成绩显著，诗人辈出，值得我们认真去研究和总结。诗人杨梓费神精心编选的《宁夏诗歌选》，旨在系统地展示这个世纪的诗人队伍和诗歌成果，把几乎所有诗人的代表作品奉献给读者。读者将会在阅读过程中，看到宁夏诗歌是怎样沿着一条崎岖曲折的道路从传统走进了现代，将会看到宁夏诗歌发展的转型、创新、继承、探索之历史，将会看到近百年间众多诗人怎样用心血汗水浇灌润泽了宁夏的文学园地。我们期待 21 世纪的宁夏诗歌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再创辉煌。是的，随着当今时代政治环境的日益清明宽松，宁夏诗人的人格也日益自由，这毫无疑问为宁夏诗歌艺术的发展提供了难得之历史机遇。虽然文学市场并不怎么令人乐观，然而事实上，那些真正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世界文学名著、中国文学名著，仍在赢得最大范围的读者。这说明，读者并没有丧失对那些真正有价值的文学的兴趣。不管世界发生怎样的变化，我都坚信：诗歌将与人类共存！

是所望焉。谨以序之。

2014 年 9 月 8 日中秋节于银川风声楼

目 录 contents

上卷 古体诗词

- 003 李 益 / 夜上受降城闻笛（五首）
005 佚名 / 西夏《大诗》片段（外二首）
007 张 元 / 雪（外一首）
008 朱 旃 / 黄沙古渡（外五首）
010 林季芳 / 漫兴
010 唐 鉴 / 秋感
011 陈德武 / 贺兰晴雪（外一首）
012 胡官升 / 芦沟烟雨
012 李守中 / 从猎贺兰山宿拜寺口
013 潘元凯 / 梅所（之一）
014 承 广 / 梅所
014 周 澄 / 宁夏
015 郭 原 / 重九
015 朱孟德 / 寒食遣兴
016 王 逊 / 长塔钟声（外一首）
017 刘 昉 / 蠡山叠翠
017 马文升 / 秦陇道中
018 释静明 / 丽景园八咏（选四）

- 019 王用宾 / 出塞曲（二首）
- 020 朱秩灵 / 秋晓过长湖（外二首）
- 021 夏景芳 / 沧洲
- 021 王 珣 / 造坝
- 022 杨一清 / 兴武暂憩
- 022 朱平斋 / 西岭秋容
- 023 王 琮 / 宁夏阅边（外一首）
- 024 胡汝砺 / 别夏城
- 024 杨志学 / 行台除夕
- 025 胡 珪 / 过田州城
- 025 唐 龙 / 豫望城次晋溪翁韵
- 026 骆用卿 / 题宁夏
- 026 保 勛 / 和静庵赏牡丹韵
- 027 冯 清 / 灵州道中（外五首）
- 029 郭凤翔 / 登须弥山阁
- 029 陶希皋 / 游南塘分微字韵
- 030 杨守礼 / 游南塘（外二首）
- 031 吴 铨 / 过晏海湖有感
- 031 齐之鸾 / 至灵州（外一首）
- 032 孟 霖 / 黑宝塔（外一首）
- 033 王崇古 / 抵塞
- 033 石茂华 / 中秋登长城关楼
- 034 罗凤翔 / 西夏思吴太恒
- 034 李 汶 / 盐川中秋对月独酌有感
- 035 萧如熏 / 岳武穆祠（外二首）
- 036 李若素 / 隆邑岁感
- 036 黄嘉善 / 防秋过预望城
- 037 苍岩道人 / 登文昌阁
- 038 黄图安 / 泛舟（外二首）
- 039 常星景 / 莲花池诗
- 039 栗尔璋 / 青铜禹迹
- 040 刘芳猷 / 野望（外五首）
- 042 俞益谟 / 过大清闸（外二首）
- 043 岳 咨 / 贺兰秋兴
- 043 张 灿 / 贺兰僧舍

- 044 俞汝钦 / 咏新月岩 (外一首)
- 044 李若樾 / 老君台
- 045 润 光 / 游贺兰山
- 045 幻 闻 / 山居 (外一首)
- 046 朱亨衍 / 过高台寺 (外五首)
- 048 杨士美 / 羚羊松风
- 048 许体元 / 文昌阁新成
- 049 胡秉正 / 晓渡黄河 (外一首)
- 050 宋维孜 / 过宁安堡
- 050 方张登 / 香岩登览 (外一首)
- 051 黄恩锡 / 石空道中 (外五首)
- 053 顾光旭 / 胜金关 (外四首)
- 055 王赐节 / 东湖春涨 (外二首)
- 056 魏殿元 / 登古佛泉阁
- 056 王家瑞 / 偕同人乘雪游贺兰山
- 057 张映梓 / 山屏晚翠 (外一首)
- 058 王三杰 / 连湖渔歌
- 058 朱适然 / 河带晴光
- 059 任景昉 / 暖泉春涨
- 059 王 绥 / 废垒寒烟
- 060 孙 氏 / 皇清孙烈妇诗 (三首)
- 061 黄 璟 / 春日刑洛城处纪事 (外二首)
- 062 徐保宇 / 通润桥散步 (外二首)
- 063 张 梯 / 平罗八景 (选三)
- 064 郭鸿熙 / 平罗八景 (选三)
- 065 范 灏 / 头发菜
- 065 王德荣 / 河带晴光
- 066 陈日新 / 重游蠡山 (外一首)
- 067 朱美燮 / 华山叠翠 (外四首)
- 069 赵惟熙 / 憩园 (外二首)
- 070 徐步升 / 原城八咏之城垣
- 070 锡 麒 / 东山秋月
- 071 韩国栋 / 瓦亭烟岚
- 071 韩庆文 / 禹塔牧羊
- 072 王文熙 / 杂咏